

N 中外历史

向着前所未闻的故事深处发掘珍贵细节

——近10年来红军长征研究新进展新认识

王毅 燕文堂

80多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影响深远而广泛，自出现起就备受关注，学界对长征的研究也从未中断过。近十年来，长征受到持续关注，在广度和厚度上都取得积极进展，表现出领域有新拓展、运用新方法、更加注重细节等特点，迄今已出版专著100多部，如《红军长征史》《长征档案》《长征回忆录》《历史的决策：长征重要会议》等，发表论文、纪念文章数千篇。

学者对长征出发标志有不同认识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瑞金；一种认为是于都；一种认为是有多处，包括瑞金、于都、宁化、长汀等。

分歧的焦点，在于对长征出发标志的不同认识。刘良认为，必须区别长征出发地、集结地和突围地三个不同的概念，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的第五号命令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显著标志；中央第一、第二纵队的长征出发地是瑞金；各军团撤离战场开始出发的地点分别是兴国和石城；于都是红军长征途经的第二个集结地。黄鹏生从军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即集中与出发相统一、整体与部分相区别、时间与地点相一致、以队伍集中后开始行动为出发标志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是于都，出发的时间是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有三种说法

近十年来，有关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五次说”“六次说”和“八次说”。

徐占权等人的《准备·密电·落脚点——〈红军长征文献〉编纂札记》考察长征中的电报后指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有五次：湘西——黎平转兵，创建川黔边苏区——北渡长江，创建川西或川西北苏区——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落脚陕北。但“五次说”并不多见，更多人持“六次说”和“八次说”的观点。

李冰梅、傅广华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最终确定及其战略意义》、肖孝华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六次选择》、张国育的《弘扬长征精神履行历史使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专家学者访谈录》、黄星的《红军六选落脚点——究竟走向何处？》等文都认为，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变化依次为：湘西——川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陕甘苏区——落脚陕北。

甘——中蒙、中苏边境（或接近苏联）——陕北。

落脚点“八次说”更为流行。徐世强的《艰难的选择：长征时中央红军曾八次改变落脚点》、马昌法《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八选根据地内幕》、饶彦久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演变》等文则指出，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变化次序基本是：湘西——川黔边（或川黔）——川西或川西北（或川滇黔边）——川滇黔边（或黔北）——川西（或川西北）——川陕甘——苏联边界——陕北。

有学者对“长征”等概念的由来做了新探讨

以往的研究中也涉及“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等概念的由来，但随着研究的推进，有些学者对以往既定的认知提出了质疑。

学界较为普遍地认为，1935年5月中共中央长征过四川冕宁一带时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使用了“长征”的提法。但张小灵的《红军“长征”称谓使用新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文章认为，1934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作报告时，把1934年夏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称为“长征”，这才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长征”概念。1935年2月转战遵义时，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长征”这个称谓。

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由来，王作化、王晋阳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说法是怎么来的？》提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只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行程，并不是所有红军的长征路程，其他红军部队有的长征路程并没有达到二万五千里，有的红军部队又远远超过了二万五千里。

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有两个重要指标

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长征中毛泽东是如何走向决策中心的。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就是此方面论著的代表。该书采取一套新型的理论模式，从“革命理想”到“政治现实”，即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逐步政治化的过程，来解释中共政治策略和权力结构的演变。这一转变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同步发生，正是此种转变提供了主观精神的力量，加以外部因素的结合，使共产党人获得



来源：人民网

了最终的胜利。

刘志兵、高晓的《从军事到政治：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的历史轨迹》也有相似的结论。该文首先界定了判断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的两个重要指标：一是毛泽东在党和红军领导工作中是否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是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是否在党和红军中居于指导地位。据此梳理出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确立的历史轨迹：在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并被采纳；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被肯定，在决定党和红军战略方针、指挥重大战役战斗、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等方面，毛泽东发挥了主导作用。

周恩来之于长征的贡献不言而喻

郭秋琴的《周恩来对红军反“围剿”、长征胜利的卓越贡献》将周恩来对长征贡献归纳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周恩来为长征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为党和红军保

护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领导骨干。长征初期，周恩来与李德等人作坚决斗争，作出了红军转兵贵州的决定，并对遵义会议的圆满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胜利会师后，周恩来坚决主张北上，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倾向作斗争。

与郭秋琴的宏观考察不同的是，彪晓红、杨飞的《周恩来与红二十五军长征》则从微观视角入手，以红二十五军为考察对象，指出周恩来的指示坚定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决心、明确了长征的方向和目的、支持了红二十五军有关长征决策的制定。

长征人物研究不再局限于宏观概括，而是从细处着眼以小见大

张闻天在长征中的作用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程中原的《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从领导层面对此问题做了宏观和系统的阐释。该书着重叙述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相互配合、领导红军长征胜利的整个历

程，还原了张闻天在长征中的历史作用和重要地位。

关于陈云和长征，何立波的《陈云1935年关于红军长征文献的形成、发现及其价值》主要依据陈云在莫斯科遗存的三份讲述长征的文献——《随军西行见闻录》《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解读了陈云对宣传长征的贡献。罗燕明的《从传奇到真相：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的报告纠正了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指出，正是陈云的这三个文献转变了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从以前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差距的浪漫认识转变为接近真实的认知。

以往涉及长征时期邓小平的研究多散落于邓小平的传记、自述或战友、女儿的回忆录中，几乎都采用了历史叙述的方式去叙述邓小平的历史贡献，而未能系统深入去探讨邓小平在长征时期的贡献。黄远声的《长征时期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探析》对此进行了尝试，指出作为长征亲历者的邓小平，在长征期间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群众、政治教育等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大众化，对长征最终取得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此外，彭德怀、李先念、贾拓夫等人在长征中的贡献也逐渐得到挖掘。相关人物研究不再局限于宏观概括，而是从细处着眼，还原某个具体史实中人物的作用和贡献，以小见大，具有越做越细、越具体的趋势。

从社会史和地方史层面扩大了长征研究领域

长征途经十余个省份，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变迁，因此将视线下移，从社会史和地方史层面考察长征不失为一个好视角。

裴恒涛的《社会变迁视阈下的红军长征与贵州社会》从政治、军事、民间信仰、民族关系及思想文化层面考察了红军长征给贵州带来的变化，是运用社会史与地方史研究方法推进长征研究的重要尝试。除此，王映泰的《红军长征在天水》、杨军的《长征·云南》、张红梅的《红军长征在陇原》、唐新顺的《红军长征过广西纪实》、刘广明的《五岭逶迤腾细浪：红军长征在郴州》、崔乾志的《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四土》、马正文和司玉国的《将台堡会师》、朱惠芳的《红军长征在汝城》、袁泽光的《中央红军过仁怀》、何飚的《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周忠瑜和杨发玉的《红军长征在班玛》等论著，也将地方史研究方法运用于长征研究中，扩大了研究领域。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来源：北京日报

N 观点集粹

空间站建设要吸取国际经验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升空，为我国未来发展自己的空间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运载技术研究院张京男指出，在未来空间站建设进程中，我国要吸取国际社会的建设经验，促进空间站建设工作顺利开展。

首先，进行有效合作。空间站工程靠一个部门或一个实体建设完成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因此，我国建设空间站要在独立自主、自身具备核心技术与大局思路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吸纳社会资本与技术力量，适当联合国际力量，为这一大型工程争取更有效的合作。

其次，进行成本控制。由于空间站建设成本巨大，需要在管理、技术、采购、方案、可靠性、可行性等方面精准规划，避免走弯路，控制好周期与投资计划，将各个环节不断优化，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最后，进行技术转化。从社会效益上来讲，空间站建设工作在带动产业链各环节发展的同时，需要有效地进行技术转化实现产业化或商业化，及时反哺社会。例如开发空间种植、先进材料、空间医学等技术向社会运用进行转化。

推行河长制需要借助民间力量

最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这标志着“河长”制已上升为国家意志。朱政在《中国环境报》撰文说，一个成熟的社会治理结构，不仅要求政府各部门履行好职责，而且要能充分激发最广大民众的潜能，因此，“河长”制在推广过程中要突出“共治”。

当前，不少地方在“河长”制推行过程中，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引入了民间力量参与。河流治理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工程，因而也最能触动百姓痛点，同样也最能得到百姓认同。今后全面推行“河长”制，更要看重于如何从制度设计层面，让百姓能有更多、长效、固定的参与渠道，使之从受损者、旁观者、评论者成为受益者、参与者、监督者，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共治格局，为环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示范样本。

共享经济是有偿经济而非免费分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在《经济参考报》刊文认为，共享经济是有偿经济，而非免费经济。以为只要是共享经济，就只能搞免费分享，而不能进行商业化谋利，那是对共享经济的误解。

今天共享经济之所以迅猛发展，是由于所有权得到前所未有的确保，才使得物种乐意将资源拿出来与别人进行交换。过去，人们不乐意把空置的房子和车子拿出来出租，是由于难以找到信得过的租客。今天，我们利用互联网技术，巧妙地克服了信息不对称的困难，才涌现出共享经济的潮流。网约车是“互联网+”的一个榜样，它解决了多年打车难的问题，促进了就业，减少了浪费，增加了安全。

乡村重建亟待文化自觉与智识嵌入

柳建坤在《学习时报》刊文提出，在新一轮的乡村建设中，乡村规划从设计到实施必须以智力资源的嵌入为前提，也就是引导精英群体进入乡村，参与乡村重建。他们所提供的智力资源才能保证乡村规划的科学性，为乡村重建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同时，文化精英的嵌入也须保证与乡村资源契合的精准性。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远景是以乡村经济现代化和社会文明化为根本指向，而关键在于围绕“资本—知识—权力”建构动力机制。在实践中，则必须以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为物质基础，并依靠文化自觉运动塑造新时期乡村文化根基以及通过智力资源的精准嵌入，以提升乡村社会文化再生产的能力。这也是推进城乡协调互补发展并建构通往“美丽乡村”和“中国梦”宏伟愿景的有效路径。

N 学者观察

大数据热中的冷思考

文军

当前，由于大数据在社会实践与理论研究上的巨大影响，有关大数据的讨论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行业和领域之中，带来了各行各业对大数据的热捧。大数据显然具有重要价值，这一点毋庸置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它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为新发明和新服务的源泉。因此，我们要大力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但在大数据热中也应该有冷思考，因为大数据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是不容忽视的。只有正视各种风险与挑战，才能更好推动大数据发展。

一、防止大数据的“去人性化”忽视人的主体价值和数据的社会文化意义

数据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它只关注“客观数据”的呈现，而缺

少对“主观数据”的反映。从社会角度看，所有数据说到底都是有关“人”的符号，因此，符号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我们真正需要了解和掌握的内容。

如果脱离了人及其所在社会的价值本性，无限放大大数据的效应及其影响力，就可能本末倒置，最终产生许多难以预期的后果。数据来源于社会又作用于社会。无论是可以数字化的数据还是不可数字化的数据，其比较、分析和归纳其实反映的都是人在符号层面上的一种互动。大数据是汇集了行为主体、时间、地点三个维度的“数据宇宙”。在大数据时代，个人的信息更多的是以数据为载体来进行互动的。如果人及其各类社会行为都仅仅被看作一个个数据符号，我们就很难从数据中解读出充满朝气、富有激情的人，也就很难从数据塑造出来的没有个性特征的人去推导群体

样态和社会构成。

二、防止大数据的“巨量化”掩盖数据个性特征、强化数据霸权

犹如网络一样，大数据也是一把双刃剑。巨量化的数据在给我们研究和分析社会现象带来便利的同时，实际上也掩盖了许多具有个性特征的数据的意义。在连续的巨量数据海洋中，许多本身具有个性特征的数据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它们在大数据霸权面前会成为微不足道的牺牲品，大数据简化了人们对数据差异性的认知。大数据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其数据样本巨量，更在于其多源异构、多实体和多空间之间的交互动态性。当前，只有少数人掌握处理这种复杂的巨量化大数据的技术，这很容易导致“数据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大数据滋生出“数据暴力”是大数据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防止大数据的“碎片化”导致人们难以系统认知复杂事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数据的价值只有在其能够被规范成为可供分析的形式之后，才能最大程度地被挖掘出来。然而，在巨量的数据面前，实际上可被规范分析的数据只是极少数，许多数据都停留在“碎片化”阶段而难以被真正挖掘和分析。对这些碎片化的数据进行清理，形成规整的结构，是大数据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根本所在。在大数据中，其研究范式重在发现而不是推论，运用大数据进行各种分析不应像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那样通过假设检验来进行推论，而应通过数据的总体归纳来达成对社会现象的总体分析。这不仅要求我们在数据清理技术、存储结构上进行优化，而且要在数据采集环节尽可能地做到规范。

四、防止大数据的“模糊化”产生大量信息垃圾、为数据造假与不当传播打开方便之门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真正需要的不仅仅是大数据本身，而是大数据背后所隐藏的我们想要获取的各种信息资源，而这些信息资源可能只占数据总体的万分之一甚至更少。从这个角度说，大量的信息其实都是垃圾。不仅如此，许多大数据本身就是模糊的，其中含有大量虚假和有害的内容。因此，未经前期调研论证和规范分析所获取的信息，其数据量越大可能越模糊，其得到的垃圾信息也就可能越多，这也为各种数据造假和不当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此，我们必须学会辨识和判断数据的真实性，避免因盲目的数据崇拜造成误判，甚至迷失在大数据的洪流之中。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来源：人民日报